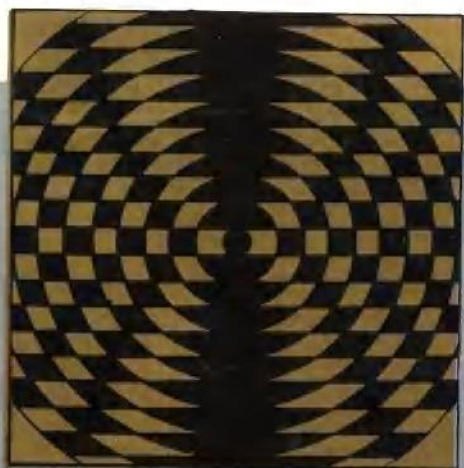


J J Q S

●顾问:刘国光 高尚全 王梦奎 黄范章 ●主编:胡晓林 龚莉 ●副主编:顾海良 姚开健

服 务 经 济

马 龙 龙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BAI • JUAN • BEN • JING • JI • QUAN • SHU

百卷本经济全书

顾问：刘国光 高尚全 王梦奎 黄范章

主 编：胡晓林 龚 莉

副主编：顾海良 姚开健

服务经济

马龙龙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服务经济理论、服务业的增长阶段、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服务业市场、经营和宏观管理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全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具相当的理论深度,又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可供从事服务经济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服务业管理的实际工作者参考。

百卷本《经济全书》总序

从现在开始的一、二十年内,是世纪交替之际,既是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便把 11 亿人民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奋力推进的时期。不言而喻,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所要进行的,实际上是要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内继续进行一场建国以来最为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这场伟大而又艰巨的变革,对经济学界、出版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要积极研究、阐明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各个经济领域内出现的复杂现象和新问题,探索新的体制、机制、秩序、法规以及发展道路和模式;传播各经济学科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观念;以使用它们去丰富现有建设者的知识库,提高他们的工作素质,以及培育新一代的建设者。这一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一切经济工作,总是要靠人去做;有了高素质的人,才会有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的经济工作,经济改革与建设任务的加速实现才会有保证。这套百卷本《经济全书》,正是为此目的而组织编撰、出版的。我对此感到高兴。

要使这套百卷本《经济全书》能够发挥应有作用,我认为,至少应该贯彻以下三个结合。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新学科或各经济领域的专业理论去研究、阐明中国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诚然,百卷本《经济全书》中有的会侧重于理论,有的会侧重于实际,有的还会侧重于应用。但只要注意贯彻这一方针,一定能在理论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并在不同层次上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改变中国经济面貌服务。二是中外结合,洋为中用。既积极学习国外一切有用的经济理论和建设经验,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成果,又不盲目照抄照搬,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有所鉴别、借鉴或吸收。三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既注重传播和普及知识,又鼓励密切联系中国国情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实行知识性与学术性相结合。

我很高兴地知道,上述三个结合,也是百卷本《经济全书》的编者、出版者的共识。诚然,要做到上述三个结合,并不容易,但值得为之努力。我衷心祝愿这套丛书的出版获得成功。

邹家华
1993年9月

前 言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经济的“软化”趋势都越来越明显,人们对于服务业、服务经济发展的理解正在日益加深,这些为服务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服务或劳务,也称第三产业或第三次产业,是同一概念。本书将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服务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与之相适应,服务经济学按其研究范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服务经济学就是生活服务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饮食、旅店、日用品修理、理发、照相等行业的活动。广义的服务经济学除研究生活服务业之外,还研究包括邮电、通讯、运输、娱乐、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在内的国民经济部门和行业的活动。实际上也就是“第三产业经济学”。本书属广义经济学,着眼点是揭示整个服务经济的一般规律。

我从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起就开始注意服务业方面的问题,以后陆续出版了两本有关服务经济和服务业管理方面的书,并开始在人大贸易系讲授

服务经济课程。现在这本书就是在我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

我在这本书里采用了与前两本书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服务经济问题。在这本书里,我试图站得更高一些,角度更侧重于宏观问题,把服务业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中去研究。本书的前三章重点讲理论问题,叙述国内外服务经济理论的发展,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评述,力争理论讲得透一些。中间三章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业市场问题,力图讲得全面一些。最后两章讲我国服务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当然,这里的管理还是侧重于服务业的宏观管理。

本书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写成的,而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又发展很快,服务经济领域内也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这些都为我的写作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书中一定还存在纰漏乃至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3年10月

目 录

服务经济

前 言	1
一、引 言	1
二、国外服务经济理论的发展	13
1. 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3
2. 前苏联经济学家对服务经济的研究	22
三、我国对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	28
1. 关于“服务”的概念	28
2. 关于服务是否创造价值	30
3. 如何把服务纳入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	32
4. 关于服务业的劳动性质	35
四、服务业的增长阶段	39
1. 服务业增长的第一阶段特征	41
2. 服务业增长的第二阶段特征	52
3. 服务业增长的第三阶段特征	63
4. 服务业增长的第四阶段特征	68
5. 服务业增长的原因	73

五、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81
1.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历史考察	81
2.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实思考	86
六、服务业市场	91
1. 服务业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的关系	91
2. 服务商品的需求	95
3. 服务市场的供求关系	100
4. 服务市场的规模和范围	103
5. 服务市场体系	108
七、服务业经营	112
1. 服务产品的一般特点	112
2. 服务市场经营的一般特点	119
3. 服务市场经营策略	124
八、服务业宏观管理	137
1. 服务业宏观管理体制的类型	137
2. 对服务业进行间接宏观管理的利弊	139

一、引言

经济思想史表明：经济学的进步和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复杂化总是以现实经济系统的变革为基本条件的。所谓变革，既包括导源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结构变动或突发性质变动的经济体制变动，也包括由资源配置模式、人口状况等因素的单项或多项变动引起的生产力变动。反之，经济学的进步和理论内容的丰富又会促进现实经济步入新的运行轨道。恰恰是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人们既要从经济学的发展中寻求实际经济变动的深层原因，又要从经济理论模式的变动中追寻新经济系统的可行模式。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思维定式的。

在封建社会，生产资料（如土地）的私有基本上是部分政治贵族的特权，他们凭借这种特权对其它各阶层进行剥削，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利润。因此他们并不需要系统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只有其庞大的家庭内部经济活动需按照较为复杂的原则去管理，然而这种原则也没有复杂到值得将其理论化。况且，原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般也不具备这种素质，因为他们

大多是实干者而非学者，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既没有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概括的兴趣，也从未感到有此必要。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些人并没有多少市场风险和经营选择权。而那些城市小商品经营者也只是通过商品交换活动获取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利用商品交换从事大规模资本积累，从而成为大资本经营者。显然，所有这些劳动者都不需要系统的经济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经济行为，而学者们也很难从这些人的经济活动中发现值得将其理论化的客观现实。

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基本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思想，人们只是针对一些颇具不确定性且又关系国计民生、反复出现的经济现象提出了种种带有概括性的学术观点。其中部分观点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奠基作用。例如欧洲 13 世纪最著名的教会学者阿尔培·魏理基和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提出了产品价值是制造产品所消耗的劳动和费用的数量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以手工业经济为背景，但却具备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萌芽。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及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为经济科学的逐步成熟奠定了基础。重商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较为系统且具体指导政府行为的经济理论。它反映出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这一理论认定流通领域

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领域,实际上是把货币看作财富本身而非财富的代表者。尽管后来的经济学家普遍否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与经济学基础理论有关的观点,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其错误夸大货币作用的观点。这集中表现在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当代经济学家,都一致把对货币流通量的调控视为解决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重要有效手段。目前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货币流通调控经济学。

重商主义之后的重农主义经济理论把视角彻底转向物质生产领域,试图从农业经济领域寻求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原始推动力,并开始把整个生产领域和其它经济领域从观念上联结起来,从整体角度探讨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则和一般发展模式。魁奈的“经济表”是这种统一性经济思维的集中表现和高度概括,正是这一点,魁奈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研究和深思的印迹。人们从这个印迹出发,可以确立系统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说就是对魁奈“经济表”中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的精彩发挥。

在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批判性继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但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从而使整体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有了逻辑出发点和推理落脚点,而且全面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重矛盾现象,并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对策。这些对策部分被统治阶段采用,成

为政府理财、管理宏观经济、调控微观经济的科学依据，部分地为后来的经济学家创立经济学新分支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思维起点或思维方法。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等人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理论体系交相辉映、各具特色，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根本异议，但却具备了同一特点：注重从总体角度考察、分析国民经济运行，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上判断单一经济现象的成因和发展方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进步，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深居书房中得到了新的灵感，而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日趋成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即将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时代，是商品经济已发展到把各类经济活动联结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限制的整体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任何一种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不可能脱离其它因素的制约。哪怕是微小的变动，都要以环境的相应变动为基础和实现条件。

到此为止，经济学还没有正式将服务经济纳入视野。只是在研究其它经济问题时，感到了服务经济也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制约因素，认识到很多经济现象的成长过程是和服务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服务经济理论体系没有形成，但服务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却已被初步定义和揭示。这些定义和揭示，虽然不够准确和完备，但却对后来的服务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便是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否定的

古典服务经济学观点,也对现代服务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对前人理论的批判恰恰是对现实理论形成的启示。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对服务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贡献较为突出的是亚当·斯密和萨伊。在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根据对前人理论的审视和对现实的剖析,不但以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划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界定了不同劳动阶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基本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服务劳动者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者,并说明服务劳动者的收入纯粹是财富分配的结果,而且初步阐明了服务经济对社会总体经济活动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萨伊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奠基作用虽然比不上亚当·斯密,但从服务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他对服务经济学理论的创建做出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亚当·斯密。这突出地表现在萨伊首先定义了无形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并指出无形产品同样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是资本的产物。基于此,萨伊分析了服务劳动者报酬的性质和客观界限,同时也对无形产品(即劳务)进行了分类。萨伊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其价值理论的必然结果,因为他基本否定了前人对生产的理解,他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

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①以后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发展,大都是建立在萨伊所坚持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必然认同萨伊的价值理论,而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普遍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主流。因此,西方经济学家认定只有从创造效用的角度分析问题,才能把服务劳动的成果列入社会财富之内,才能把服务经济归入国民经济大系统之内。

对服务经济理论的发展贡献较大的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是巴斯夏。巴斯夏不满意前辈的价值理论,试图创建更能体现他的“经济和谐”思想且可圆满解释社会交换活动的价值理论。正是在思考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巴斯夏顺理成章地把服务经济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只是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和理论思考的局限性,他并没有把自己理论起点内就包含的服务经济思想扩展到他的全部理论中去,也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全面阐释服务经济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巴斯夏认为:服务也是资本,是物^②。劳动可以归结为人们彼此提供服务,因此,交换也就是服务的交换。所以,价值就是两种服务交换的关系。衡量服务有两个尺度:一是提供服务的人的努力和紧张程度;二是获得服务的人摆脱的努力

① 参见【法】萨伊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第59页。

② 参见【苏】卢森贝著:《政治经济学史》第Ⅲ卷,第294页。

和紧张程度。正是出于这种价值理论及与此相关的交换论,巴斯夏不仅把服务劳动者,而且也把上层建筑诸行业的人们如军人、警察、政府工作人员等统统视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比萨伊走得还远、还彻底,以至于巴斯夏“合乎逻辑”地否定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划分的必要性,从而也就使人们不能利用他的理论去分析、观察国民收入分配圈流内的结构状况。

古典经济学中服务经济理论的这种状况是由当时服务经济的发展现实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处的时代,服务经济虽然已经较为系统化,服务劳动者也形成了一个劳动阶层,劳务已成为各阶层人们的消费品,服务业就业状况对社会总体充分就业能否实现的制约作用也正初步明朗化,但服务业毕竟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系统的关键部门;劳务也还没有成为人们大量消费的商品;而且服务业企业规模和固定就业规模还相对较小。这些必然使得经济学家只能对服务业系统内的基本现象进行初步的规范化概括,而不可能对服务经济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理论总结。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日趋成熟。马克思经济理论不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和社会生产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而且还指出了决定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技术性因素和体制因素,并展望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初步构造了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是任何一个经济学流派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其它经济学流派只是对既定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引发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成为深入到一般群众心灵中的理论武器,从而促成了贯穿 20 世纪始末的国际政治格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和相互制约。

马克思的服务经济理论是他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马克思重新确立了劳动价值论,指出了商品的二重性,认定商品是劳动的凝结物,商品的立体模式只是物质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并不代表商品的实质。这样就把服务劳动生产成果也归入商品之内。另一方面,马克思则从生产关系和劳动一般性两个角度界定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既创造价值又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受资产阶级雇佣的服务劳动者(如歌女)的劳动也视为生产性劳动(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劳动可为资产阶级带来剩余价值)。我们从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过程与生产性劳动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肯定了服务劳动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都有可能属于生产性劳动。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马克思还指出了服务经济与社会分工细分化的联系,向人们揭示出服务经济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分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社会分工不断向前发展。同时,马克